

群经要义

陈克明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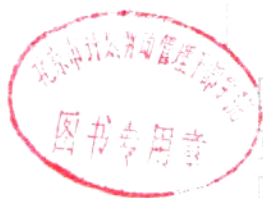
東方出版社

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



L005859

群 经 要 义



陈克明
著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夏 青

装帧设计：刘林林

版式设计：赵迎珂

责任校对：智福和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群经要义/陈克明著

-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1996.12

ISBN 7-5060-0739-8

I. 群…

Ⅱ. 陈…

Ⅲ. 儒家-经籍-研究

IV. ①B222 ②Z12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23927 号

群 经 要 义

QUN JING YAO YI

陈克明 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13.125

字数：318 千字 印数：1—3 000 册

ISBN 7-5060-0739-8/B·95 定价：21.80 元

专家推荐意见

陈克明同志广泛吸收前辈学人研究经学的成果，并能提出自己酝酿成熟的学术评断。此书稿有科学水平。

中国经学包罗万象，涵盖了古代文化知识的众多学科。现代人治学，从大学开始，即从事分科分系讲授古代文化。治《诗经》者偏重于文学，治《尚书》者偏重于史学，治《易》者偏重于哲学。实际情况并不像现代大学及研究机构分科分系这样简单，群经之间互有交叉，多方渗融，决不可找出截然划分的界限。学术界学者中，找一位兼通群经的专家已很困难。有些专家有此学识，或因年高体弱及其他原因，能执笔撰写《群经要义》的已不多。陈克明同志是我国学术界少数专家中的一位。他年过七旬，体弱多病，他肯动笔撰写此书，值得鼓励、支持。

陈克明同志自备《皇清经解》、《续经解》，朝夕披览，寝馈不废，钻研多年，篝灯撰写此书，十分难得。

该书稿纲目谨严，章节明晰，论述亦能要言不赘，得其肯启。此书出版必将有益于学术界。

为此，我愿负责向出版单位推荐这部书稿，希望能早日问世，以饷读者。

任继愈

1996年6月20日

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有重要地位，在以往的目录学中，经属于四部（经史子集）之首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，经学受冷落，研究经学的著作较少，其实经学还是值得研究的。我们现在要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，对于古代经学的内容应加以分析研究。

陈克明同志著《群经要义》，对于十三经的形成过程作了较详的说明，对于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三礼》、《春秋三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以及《考经》、《尔雅》的主要内容做了较详的阐述，对于历代经学研究以及清儒经学的成绩做了较详的评论。全书资料详实，议论平允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特此推荐！

张岱年

1996年6月1日

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

本书作者长期研究经学，曾出版《隋唐经学》、《中国的经学》两部著作。本书在采集有关原始资料的基础上，对十三经的形成变迁、主要内容和后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分析，论述细致、深入，得中国经学大旨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

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叶秀山

1996年7月23日

目 录



引言	(1)
一 《周易》通论	(13)
二 《尚书》评述	(54)
三 《诗经》撷英	(82)
四 《三礼》简介	(119)
(一)《周礼》	(124)
(二)《仪礼》	(150)
(三)《礼记》	(160)
五 《三传》纪要	(179)
(一)《春秋左传》	(192)
(二)《春秋公羊传》	(210)
(三)《春秋谷梁传》	(214)
六 《论语》浅解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	(228)

七	《孟子》试探·····	(279)
八	《孝经》初议·····	(331)
九	《尔雅》攬胜·····	(367)
	后记·····	(413)

引 言

（一）中国经籍的起源

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，她与埃及、印度等并驾齐驱，通过“摩顶放踵”、“胼手胝足”的艰苦劳动，克服困难，树立信心，战胜各种自然灾害，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不少光辉灿烂的篇章。由于中国保存的历史文献特多，这些文献记载，后来多被儒家学者们所继承和整理，通常则谓之“经籍”。因此儒家“经籍”乃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础，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。

英国李约瑟博士在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的序言里曾经这样概括：

“目前有一点是肯定的。没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多民族集体曾经垄断过对科学发展所作的贡献。各个民族的成就，应该由全世界人民携起手来共同赏识，纵情歌颂。”

科学技术的发展固然如此，而其他文化领域里的成就也应该同样看待。后来者可以各自回顾其历史概况，各自描绘其生动情景，但不必在轻重得失上去过多地评头品足，因为时间有先后，条件有好坏，各国祖先的成就难免有大有小、有粗有细。总之，它们都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，值得大家为之骄傲、欣赏和推崇。例如希腊哲人苏格拉底，印度哲人释迦牟尼，中国哲人孔丘，他们的生活时间相去不远，而成就和贡献则各不相同，但又各有千秋，又何必去评论其长短、优劣呢？！

中国文字起源甚早，大概经过象形、指事、形声、会意、转注、假借六个发展阶段和形成方式。^①及至夏、商两代才把文字作为记事的符号和工具而刻写在兽骨或龟甲上。其中某些重要文献后又常常铸在各种青铜器皿上，为数不可能太多。延至周代，书写工具稍有进步，逐渐改用木版或竹简，贵重者仍然利用铸造方式，以昭郑重，如铸鼎记事，铸刑书等。对刻写在木版上的文字，后乃常称之为“方版”；对刻写在竹简上的文字，后又常称之为“简册”。故《仪礼·聘礼》曾这样记载：

“若有故则卒聘，束帛加书将命，百名以上书于策，不及百名书于方。”

根据《论语郑（玄）注》：“古者曰名，今世曰字。”可见“名”、“字”属于一样东西，均指文字，实为同语反复。后来才连在一起使用，已与原来仅指文字又略有不同。看来东周、春秋时代，诸侯各国互遣使者致聘，其文书较长而超过百字以上者则书于竹简；内容较略而不及百字者则书于木版。这种习惯规定，即

① 郑樵《通志略·六书序》：“象形、指事，文也；会意、谐声（即形声）、转注，字也；假借，文字俱也。”又谓：“圣人之道，惟藉六经；六经之作，惟藉文言；文言之本，在于六书。”

约定俗成，反映文书的使用已经流行，而木版又不如竹简方便，何况竹简可以装订成册，也较好携带。晋人杜预《左传序》也有相近似的记述：“大事书之于策，小事简牍而已。”唐人孔颖达作《正义》时对此又作了疏解，其大意为：“策”指成册竹简，“简牍”指单片竹简和木版，由于字数有多有寡，而选用材料又可以有所不同，“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，数行乃尽者书之于方，方所不容者乃书之于策”。换句话说，当时的文书材料已有三种类型：即单片的竹简，单片的木版，以及装订成册的竹简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文字的利用率也越来越高，书写的工具势必随之改善和增加。但当时尚未发现利用布帛，更谈不上发明造纸，故只能在木版、竹简上多想些办法，因而有上述几种的区别。当时装订竹简，常用两种材料，一是用皮条，取名叫“韦”；一是用丝麻，取名叫“经”。在孔子生活时代还多用“韦”。所以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有“孔子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”的记载，看来“经”的使用或许较“韦”稍晚。利用丝绳装订竹简，使之成册，称之为经编。它更加符合实际，在使用上也更加方便。

（二）中国经学的形成

“中国经籍”起源较早，但“中国经学”形成则较晚，应该说是形成于汉代。从西汉到清代末年这两千多年的岁月里，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，中国经学也随之壮大和成长。历代封建统治者不论是采取“文武并用”即“软硬兼施”的策略，还是采用“儒法合流”即“阳儒阴法”的治术，尽管不断变换手法，但在认识上都存在一个由不自觉地比较自觉的过程。秦始皇并吞六国后，雄心勃勃，原本想“一世、二世、万万世”，可是由于缺乏经验，他偏重“学在官府”，力求“同文”、“同轨”，这样做有一

定的道理，但“仁义不施”，加上“攻守势异”（贾谊《过秦论上》），只知实行高压统治，不知安抚百姓；只知一味进攻，不知留有余地，故严重脱离群体，变成孤家寡人，遂遭惨败，仅维持约三十年。

汉代统治者利用前车之失，作为后车之鉴，总结了秦代速亡的经验教训，深知在马上可以得到天下，但不能在马上治理天下的道理，改而采用“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，文武并用，长久之术”等建议（《史记·陆贾传》），实施“文武并用”的治国方针。汉高祖也由轻视诗书，转而重视诗书。首先起用儒生叔孙通等人制订朝仪，并逐步走向礼治和人治。虽在文、景二帝时代，曾经一度出现侧重“黄老之治”的稳妥作法，即提倡“在上无为”、“在下有为”等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，但“文武并用”的基本方针并未动摇。经过约四十年的摸索试验，社会逐渐趋于稳定，生产也有所发展，但同样出现某些消极因素，而且难以克服。汉武帝即位不久，乃在建元五年（公元前136年）置“五经博士”，并接受儒生董仲舒的提请：“凡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。邪僻之说灭息，然后统纪可一，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从矣。”（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）此即后来常称之为“独尊儒术，罢黜百家”的建议。上述建议又是董氏“天人对策”的最后部分和核心。追源溯流，实行“罢黜百家”，丞相卫绾早有类似的设想。建元元年（公元前140年），“丞相（卫）绾奏：所举贤良，或治申、商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，乱国政，请皆罢。奏可”（《汉书·武帝本纪》）。可见百家之言，汉武帝即位伊始，由于它们淆乱视听，有害国政，早已不受欢迎，不过董仲舒加以促成而已！这反映重视儒术、发展经学，乃是汉代思想潮流的总趋向。汉代统治者之所以促使这种局面的急剧转变，又是由于认真总结成功失败等经验教训所造成。因秦代偏重“法治”，出现过“刻薄寡恩”

等情况，固然不利于统治；而汉初提倡“黄老之治”，又过分强调遵循旧规，同样也不利于发展。必须重视“文武并用”的进取精神，兼用儒家“内圣外王”的修持工夫，推行“三纲五常”即“君臣有义、父子有恩、兄弟有和、夫妇有顺、朋友有信”等行之有效的做法。加上儒家提倡践履，力图设法将国家、家庭和个人构成一个团结互助、鼓舞前进的整体，因此儒家思想很适合封建统治者长治久安的需要。“儒术”既然受到“独尊”，儒家著述的各种经籍自然也会受到重视。儒家祖先周公、孔子等，不言而喻，又自然会受到敬仰。由于先秦时代儒家仅为“百家”之一，加上秦代又曾经“焚禁诗书”，所以到了汉代，经籍大多残缺不全，故首先必须解决传授和整理等问题。但当时凡能口传面授的则尽量加以记录，否则只好通过搜集残卷，发现藏书，来解决有关需要。这样，必然又将出现文字有古、今之辨，地区有齐、鲁之分，得到承认者有先、后之别等等问题，难免酿成派别纷争、门户对立、人主出奴、此疆彼界等情况。在汉代经学领域里很快掀起各种不同论争，而且愈演愈烈。我们要想弄清有关情节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，确实不太容易。幸而前人在浩如烟海的经籍里，从事开拓经营和钩玄提要等工作，留下不少研究成果，可供后来者参考和研究。

（三）中国经学的历史地位

儒家经籍，本来并非“一家之言”，而是中国文化长期积累留下的产物。它体现了古代哲人的劳动成果和聪明智慧，可以说它是中国文化的摇篮和总汇，也是中国最早和最全的一部百科全书。它的内容十分丰富，涉及范围很广，试图探讨宇宙和星球的起源，人类和其他动植物的生长形态以及天文、地理、物产资源、风土

人情、民歌国颂、典礼制度，甚至占卜、筮辞以及鸟兽、草木、虫鱼等等，几乎应有尽有。其内涵既包括自然科学，又包括社会科学，大至于治国、平天下，小至齐家、修身、养性，都可从经籍里发掘出各种有关资料，搜集到各种珍贵信息，把握理性，悟出真知，我们不妨借用中国一句古话来形容：中国经学也是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（《中庸》）。若从深奥难测的理论高度去观察，有些道理至今尚难加以穷究；若从一般实际运用的角度去驾驭，它们又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，真是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”。我们这样来形容它，绝不是什么有意夸大，而是一种比较接近真实的写照。

中国经学同群体、家庭、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，甚至有些内容直至现代还在不断发挥作用和影响。例如人际关系中一向提倡的忠、恕、仁、爱、信、义、和等道德观念和规范，不少则是万古长春，永不凋败。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在真空中生活与生存，必须时刻同外界发生各种交往和接触，那么“尽己之谓忠，推己之谓恕”；“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义”；“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”；以及互敬互助等等原则就必须遵守和运用。而上述规范和道理乃在中国儒经里反复出现。因此中国经学是文化风尚的母体，也是中国人民健康成长的抚育者。其中某些规定，现代中国人也许不再直接受其支配，但却间接还受其制约或影响。例如孔子曾经说过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；“不学礼，无以立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。人们直接受到诗、礼支配的时代，虽然早已过去，但若从学诗、学礼所包涵的广义来说，“诗”系泛指各种有韵文学，若不懂得中国有韵文学所派生的歌谣等，乃较难从事写作与交谈；“礼”乃泛指立身处世的普遍原则和道理，若不懂得人我之间的准绳和要求，也较难组织和参与各种社会活动。因此所谓学习诗、礼永远不会成为过去。时代在前进，认识在提高，某些原理、原则也在不断更

新和充实。中国经学既然对文化风尚、哲理政论和人们思想言行长期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，那就不是通过某种政治革命运动或思想清理工作所能改变或消灭的。我们对过去某些偏激作法不必深责，旧梦也不必重温，只要采取认真负责、正确对待的态度，用其可用，去其当去，“弃其糟粕，取其精华”，继承和发扬其中某些有价值的东西，充实人生的思想内涵，提高大家的道德素养，自我完善，自我珍惜，不再自我糟蹋，不再自我毁灭。因为“尔虞我诈”的社会，绝不是健康的社会，“数典忘祖”的人，也绝不是完美的人！

（四）中国经籍的主要内容

中国经籍究竟包括哪些内容？也是首先应当说明的一个问题。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师徒在“诸子竞起、百家争鸣”洪流的激扬下，根据古代的图书档案，特别对宇宙形成的学说，政治的发展蓝图，道德行为的规范及其要义等比较感兴趣，故将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融会贯通，加上自己的缜密思考和逻辑推理，次第编成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六种古籍。开始还叫“六艺”，后来才叫“六经”（见《庄子·天运篇》及《天下篇》）。或说《乐》经早亡，或说《乐》经未曾编成，流传下来的实际只有“五经”。经过秦代的焚书浩劫，除《易》为“卜筮之书”得以侥幸保存外，其余各经，大多惨遭不幸。进入汉代，“五经”均残缺不全。前面提到：儒生和儒经在汉代初年尚未引起统治者的足够重视，故又耽搁了几十年的时间。后来“五经”才被提上议事日程，立于学官，设置博士，国家给予比较优厚的待遇，吸引大家从事经籍的整理和研究。在此基础上，“五经”再经过不断的扩充，“礼”又分为“三礼”，即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和《礼记》；《春秋》也分为

“三传”，即《公羊春秋传》、《谷梁春秋传》和《左氏春秋传》。外加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，合在一起，这时统称之为“九经”。汉、魏时代曾将这“九经”刻在石上，立于国子学内，用以表示郑重和文字划一。继而又将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和《尔雅》上升为经。到了唐代，“十二经”已经得到国家的正式认可。到了宋代，大儒朱熹又从《礼记》中抽出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，并将《孟子》从诸子里分离出来，上升为“经”，且与《论语》并列，编在一起，命名为“四书”。故原有的“十二经”，增加《孟子》之后，则变为“十三经”。从南宋到清末，“十三经”的称号一直保持未变，这是“十三经”编辑的大致过程。它们排列的次序是：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左传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春秋谷梁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孟子》。清代阮元刻印了《十三经注疏》，这是后来比较流行的常见本。近年又将该书重印问世。

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“独尊儒术”，曾经想尽各种办法。归纳起来也不外乎两种：一是提高儒家学者的地位，二是加强对儒家经籍的宣传。“士农工商”，“士”则列为四民之首；“经史子集”，“经”乃居于群书之冠。汉代先后立于学官的“五经”，均设置博士，博士又可带领弟子，他们身居高位，日食厚禄，研治经籍，传播儒学。实际从此以后，经学长期受到重视。魏、晋、南北朝时代，玄学、佛学一度盛行，不免稍领风骚，但儒学的地位并未降低多少，一因儒学早在历史上占有优势；二因谈玄、赞佛者也有不少出身于士族，开始还常以《易》、《老》并称，到梁时又将《庄》、《老》、《周易》称为“三玄”。除出家为僧、为尼、为道士、为女冠者外，在家修行者又多称为“居士”，平日的生活习惯则常与儒生文人大致相同，这既反映士族的地位没有多少改变，同时还反映儒生的风尚早已深入社会人心。故魏、晋、南北朝时代对

经学的研治并未中断。研治方法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大流派：一派侧重探讨经学原理，常与释、道同流；一派仍守汉末旧习，多在章句训诂上耗费心力（参看吕思勉《两晋南北朝史》第二十三章）。到了隋、唐时代，建立科举考试制度，共设六科，其中主要为进士、明经两科，进士科考试经义，侧重采用诗文形式予以表述；明经科考试经文，要求应试者牢记默诵章句。国家典试，后来又分别在礼部、吏部举行，先从礼部考中进士、明经等，均属虚衔；再经吏部考上博学鸿词，才有实授机会。总之，科举制度的吸引力很强，成为读书人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一条捷径。考中后，不仅身份抬高，而且从政有望，此乃宣传儒学、重视经籍的主要良策。而释、道两教则无此机缘（唐代偶尔仿效试行，但为时较暂）。类似的科举考试，一直延至清末不变。元、明、清三代还将策论改为制艺，即八股文。尽管考试的内容稍有变化，但开科取士，吸引人才，提倡读经，要求通经，其主旨则始终未变。因为历代封建统治者一面牢笼儒生为其所用，一面发挥儒经影响使之渗透到意识形态各个领域，则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既定国策和不变方针，因而也相应促使儒生对经籍研讨的愈益深入和发展。在封建社会里，一个人从小到大，莫不时时刻刻要同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直接或间接发生关系，熟读钻研，信奉遵行，几乎成为每个人思想、言行的最高准则，读书只能照本宣科，反对离经叛道。我们应该看到，经学对中国文化的积极作用，但对中国风尚的消极影响，也不可掉以轻心。

清代章学诚曾经提出：

“六经，皆史也。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，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。”（《文史通义》卷一《内篇一》）

章学诚提出“六经皆史”，此论概括性较强，后来得到较多学者的欣赏与赞同，如龚自珍、章炳麟等。龚自珍乃说：“夫六经者，

周史之宗子也。”又说：“故曰六经者，周史之大宗也。”（《定庵续集》卷二《古史钩沈论二》）章炳麟也说：“学诚以为六经皆史，史者固不可私作。”（《国故论衡》中《原经》）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，其中不少多来自“官书”；龚自珍则进一步补充，他认为“六经皆史”，其中不少是出自“周史”；章炳麟又认为“六经皆史”，说明其中多数不是“私人著述”，尽管表达的方式各有不同，但内容则大体一致，不过略作补充、说明而已。此处不妨代作归纳为：《易》是卜筮之史，《尚书》是周代以前之史，《礼》则多是周代典章制度之实录，《诗》乃多是周人民歌国颂之写真，《春秋》则是东周至战国初年各国之大事记。证明“六经皆史”可以成立。章氏等上述有关论点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六经的理解和认识。

总之，儒家“六经”演变成为“十三经”，它是我国最早和最全的一部百科全书，在我国的历史长河里，曾经盛行和发展了约三千年。汉唐以后，世界各地和中国的交往逐渐增多，儒家经籍和经学也随之散布世界各地，并扩大其影响。

据《旧唐书·日本传》记载：武则天长安三年（公元703年），日本乃派大臣真人前来贡献方物，“真人好读经史，解属文”。看来经学早已传入日本，而且受到重视。唐玄宗开元初年（公元712年），日本“又遣使来朝，因请儒士授经”。反映经学已在日本生根发芽。从此以后，使臣、僧侣往来更密，文化学术交流机会更多。

高丽、百济、新罗距离中国更近，受到中国文化影响更早。例如高丽人“俗爱书籍”，各家常在街衢建造“大屋，谓之扃堂”。子弟未婚之前，昼夜于此读书、习射，其书有五经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，尤其爱重《文选》。唐代初年，两国失和，酿成战争，后得平定。百济人“岁时伏腊，同于中国，其书籍有五经、子、史。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”。新罗“其风俗、刑法、衣服与高丽、百济